排灣族古陶壺的紋飾藝術

撰文、攝影｜盧泰康

臺灣原住民排灣族所保存的傳世古陶壺，在排灣族族語中稱之為*dilung*、*reretan*、*dredretan*，是臺灣各原住民族所保有的各類傳統文化藝術中，最具深厚歷史傳統與文化內涵的傳世文物之一，同時亦是最能代表原住民族群特色的工藝美術類型。有關於排灣族古陶壺的造形特徵，筆者曾經在針對排灣族古陶壺的專題研究中，進行了全面性的具體分析與討論；[1] 根據排灣族古陶壺的形態特徵，區分為五種類型；分別是第一類「圓形壺」，所占數量最多，「菱形壺」數量次之，其餘分別是「垂珠形壺」、「瓶形壺」、「扁壺」，數量較少。這些古陶壺皆屬「裝盛用容器類」陶器，完全沒有鍋、盆、杯、碗、盤之類的炊煮或飲食用器，可知這些珍貴的排灣族傳世古陶壺，在功能上已經「完全脫離了日常餐飲器具的實用功能」。排灣族人認定這些傳世古陶壺為「不朽的存在」並擁有「神力」，在族人的神話與傳說之中，古陶壺被認定為生命的源起與祖先神靈，同時也是族群繁榮興旺的保證。至於本文主要則是介紹排灣古陶壺的紋飾特徵、表現形式，及其相關文化脈絡與來源。

一、排灣族古陶壺的紋飾特徵

排灣族古陶壺器身所見紋飾，依其裝飾工藝手法，可分為浮雕裝飾、陰線刻劃與戳印紋、彩繪與穿孔等數種。排灣族古陶壺器身上的各種紋飾，會被排灣族人細緻的辨識區分，其指涉認定的母題內容，包含了太陽紋、人形紋、百步蛇捲曲紋、蛇背紋、蛇側身紋、蛇腹紋或梯田上的粟紋、組合紋（由兩種或三種紋飾組成）等等。以下分述三類紋飾之工藝特徵及其中具有代表性之紋飾：

（一）浮雕裝飾

以泥條貼塑於器身做為裝飾，表現出立體化的浮雕式效果。其題材包含了蛇形紋、圓鈕紋、泥條連弧紋、泥點紋、彎月紋、三角紋與倒Ｖ紋等類型，以下分述：

1. 蛇紋（百步蛇紋）：

蛇紋是排灣族陶器裝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題材，裝飾於陶壺肩部，浮雕蛇紋依其視覺效果之立體感強弱，有「高浮雕」與「淺浮雕」之別。以目前所見實物案例觀之，高浮雕蛇形紋幾乎僅見於「第二類菱形壺」之上，且多對稱出現於陶器器身肩部，蛇身體積碩大，多以兩條一組，蛇頭朝上，頭形呈菱形或三角形，蛇身相對，蛇尾向相反方向的兩側蜷曲，蛇頭刻劃出眼、嘴等，蛇身表面飾以陰線刻劃菱形、三角形或戳點紋，例見圖１日治時期高雄州カピヤ社傳世古陶壺。[2] 另有八條雙股對稱者，蛇身較為細瘦的形式，見於屏東縣泰武鄉的調查案例（圖２），[3] 立體感較弱的淺浮雕蛇形裝飾，蛇身亦呈現雙股對稱，出現於排灣族「第五類扁壺」中，可見收藏於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圖３）。[4] 至於蛇身筆直，排列方式呈現環繞口部平行對稱的蛇形淺浮雕，則出現於「第一類圓形壺」中。此外，在排灣族第一類圓形壺中，另可見一種特殊裝飾技法，其表現手法是僅有蛇頭部份為立體浮雕，蛇身則為刻劃陰線紋（圖４）。[5]

2. 圓鈕紋：

圓鈕紋屬於一種半球面高浮雕，裝飾於陶器肩部。依其裝飾特徵可分為兩種；第一種為連續圓鈕浮雕，以一至二排圓鈕水平環繞於陶器肩部，例見屏東縣瑪家鄉私人收藏（圖５）。第二種為僅有二至三個圓鈕成組排列裝飾於器身。以上這種具有立體特徵的圓鈕，常被視為女性乳突的象徵。

3. 泥條連弧紋：

以圓弧形泥條連續排列裝飾器肩，圍繞器口形成弧狀花式紋樣，多出現於「第一類圓形壺」中，例見臺東縣文化處收藏（圖６）。[6]

4. 泥點紋：

以小型泥點成二排或三排水平環繞於靠近器口之肩部，多出現於「第一類圓形壺」中，有時與泥條連弧紋配套出現，例見上述圖６陶罐肩部細節（圖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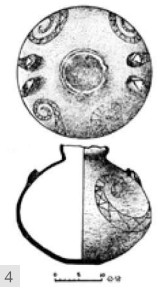
5. 彎月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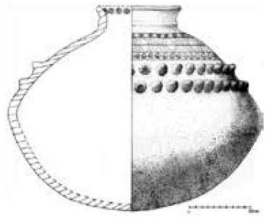
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浮雕彎月狀泥條成雙排環繞於肩部，另一種是浮雕彎月紋單獨出現，彎月紋尖弧朝下裝飾於器身，具有同樣裝飾特徵者亦可見於魯凱族古陶壺，例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收藏（圖８）。[7]

1

2

3


4


5

6

7

8

註 1 ｜盧泰康，〈臺灣原住民排灣族古陶壺研究〉，《逢甲人社學報》第 40 期，2020 年，頁 25-84。

註 2 ｜鈴木秀夫，《臺灣蕃界展望》，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1935 年，頁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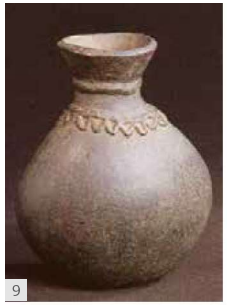
註 3 ｜任先民，〈臺灣排灣族的古陶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9 期，1960 年，頁 194。

註 4 ｜許雅惠，《慰藉心靈的藝術：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典藏文物》，臺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999 年，頁 194。

註 5 ｜改繪自任先民，〈臺灣排灣族的古陶壺〉，頁 181。

註 6 ｜盧泰康、邵慶旺，《108-109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文物陳列室列冊追蹤之無機材質文物第二階段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委託單位：臺東縣文化局，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20 年，頁 221-269。

註 7 ｜盧泰康，《臺灣原住民陶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委託單位：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0 年，頁 397。


9

10

6. 三角紋：

泥條貼塑，僅見於排灣族「第五類扁壺」的頸部與器肩交接處，特徵為環狀泥條以下連接數量不等的連續倒三角形泥條裝飾，例見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收藏（圖 9）。[8]

7. 倒 V 紋：

倒 V 形泥條貼塑，可見於排灣族「第一類圓形壺」肩部，但最常見於「第五類扁壺」的頸部與器肩交接處，以環狀泥條連接倒 V 形泥條裝飾，例見日本天理參考館收藏（圖 10）。[9]

（二）陰線刻劃紋

以硬質尖銳工具所刻劃的陰刻細線紋，是排灣族古陶壺裝飾中，最常見的裝飾方式。各類陰刻線紋配合浮雕或戳印紋，在陶壺肩部組合成各種具有群組關係的圖案。至於在表現題材上，則是以蛇紋（百步蛇紋）與各類幾何紋為代表。

1. 蛇紋（百步蛇紋）

以陰刻線條表現蛇紋，蛇紋造形有同於浮雕蛇紋者，兩條一組，蛇頭朝上，頭形呈菱形，蛇身相對，蛇尾向相反方向的兩側蜷曲，蛇頭刻劃出眼、嘴，蛇身以陰線刻劃菱形、三角形或圓弧紋（圖 11 上），另有雙頭蛇形，兩側蛇頭朝上，下以蛇身相連，飾以三角紋、菱形紋。蛇身內側有二圓圈紋（圖 11 下）。[10]

2. 幾何陰線紋與戳印紋

種類繁多，包含直線、弧線、平行斜線、方形、長方形、菱形、三角形、波浪形連弧線紋、鋸齒紋等，各種紋飾組合排列圍繞裝飾器肩，所形成各種群組圖案。至於戳印文則是以圓圈紋與細點紋代表。圓圈紋是以竹管或稻麥桿，在坯體戳印小圓圈或同心圓圈。細點紋則是以尖狀物密集戳刺坯體，形成點狀塊面裝飾效果。幾何陰刻線紋與戳印紋經常相互配合出現，見圖 12、圖 13 線繪稿圖示，[11] 另以臺東縣文化處所藏古陶壺為例，測繪圖與器肩紋飾拓本見圖 14。[12]

（三）彩繪與穿孔

在筆者實地調查記錄資料中，尚發現一件可能為排灣族陶器施彩裝飾的罕見案例，現收藏於臺南市文化局鄭成功文物館。[13] 此件古陶壺被歸屬於排灣族第一類圓形壺，其造形特徵為撇口，束頸，肩部殘存明顯波浪形複線紋黑彩裝飾（圖 15），器腹圓弧，圓底，器底正中可見一圓形穿孔，本壺肩部黑彩「波浪形複線紋」或可對應於排灣族陶壺肩部的陰線刻波浪紋，而在陶罐器底有意識穿孔的行為，在排灣族傳世古陶壺中頗有所見。此外，在施翠峰先生實地訪查資料中指出，排灣族人將該陶壺視為具有生命之物，故在訪問時族人答稱「古時候製壺者把壺視為人，所以必須打個洞，使他呼吸」。[14]

註 8 ｜ 許雅惠，《慰藉心靈的藝術：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典藏文物》，頁 195。

註 9 ｜ 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會，《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所藏ー台湾原住民の生活用具》，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93 年，頁 38，No.22。

註 10 ｜ 任先民，〈臺灣排灣族的古陶壺〉，頁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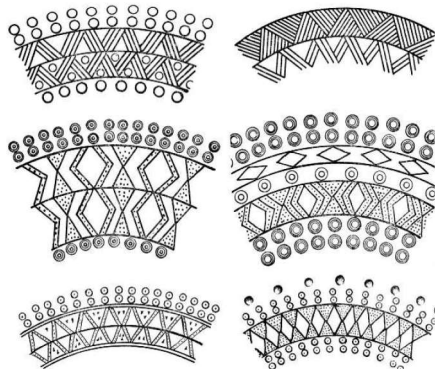
註 11 ｜ 出處同前，頁 202-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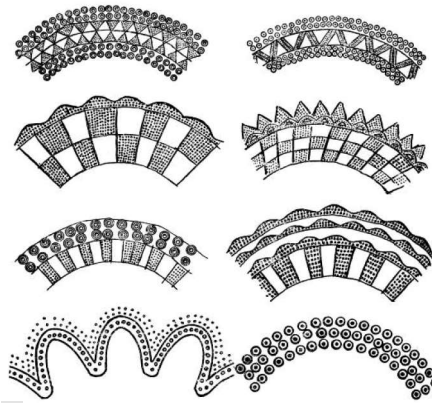
註 12 ｜ 盧泰康、邵慶旺，《108-109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文物陳列室列冊追蹤之無機材質文物第二階段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頁 221-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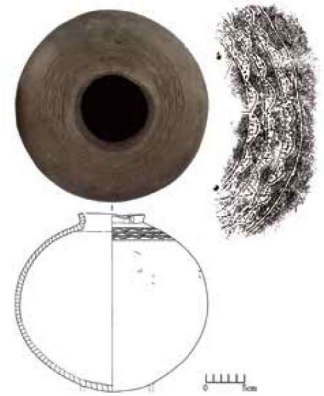
註 13 ｜ 盧泰康，《臺灣原住民陶研究計畫》期末報告，頁 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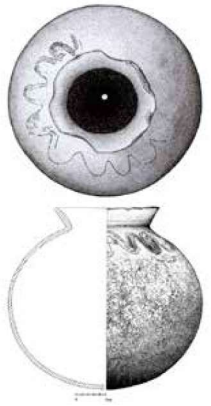
註 14 ｜ 施翠峰，《臺灣原始藝術研究》，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5 年，頁 169。

11


12


13


14


15

二、古陶壺紋飾與等級區分的關聯性

古陶壺作為頭目或貴族家的傳家之寶，反映了排灣族各等級貴族之間的關係和地位。古陶壺在排灣族族人的觀念中，被有意識地區分為各自不同的等級，而該族對於陶壺等級之間的認知方式，儘管存在多種概念且其細節不甚相同，但陶壺上的「紋飾內容」可以算是最關鍵的區分標準。以學者任先民先生調查所記錄屏東地區中、北部排灣族陶壺的七個等級為例：[15]

註 15 ｜ 任先民，〈臺灣排灣族的古陶壺〉，頁 164-165。

第一等級：稱為 *venaleiage lageinaway*，具有浮雕蛇形紋飾，此類陶壺多為貴族直系大宗的傳家之寶，絕不能隨意流入別人家裡。根據筆者所收集之古陶壺實物進行比對觀察，只有在「第二類菱形壺」之中可見高浮雕蛇形紋，多對稱出現於陶器肩部。

第二等級：稱為 *teraday*，具陰刻蛇形花紋，其重要性不亞於第一等陶壺。在本研究所分類之「第一類圓形壺」、「第二類菱形壺」與「第三類垂珠形壺」之中，皆可見此類陰刻蛇形花紋。

第三等級：稱為 *pienasinisoay*，有圖案式蛇形花紋，及浮雕式的乳狀黏附環點。有時在肩部附有穿耳，以便穿繩攜帶，則另外稱 *pienasinisoay potsaaanie*，這一種陶壺，有時作為貴族大頭目家婚嫁時互贈的聘禮，但不可能贈給較低級的頭目。

第四等級：稱為 *silegct*，僅有普通蛇形圖案花紋，雜以圈點花紋。

第五等級：稱為 *venavenar*，是由兩圈花紋組成，圈內為方格式長方格或菱形方格的點狀花紋，外圈為二或三、四道波浪形的花紋的陶壺。

第六等級：稱為 *ren quieaanie*，是由普通的圈或點組成花紋，環繞在肩部二或三、四道。

以上第四、五、六共三等古陶壺，可作為大頭目對二、三級頭目婚嫁時的聘禮，也可以作為交換其他物品或出賣給人的貨品。此三個等級古陶壺以裝飾各種幾何陰刻線紋、戳印紋為主。

第七等級：稱為 *peialei ja tso ku tso lan*，只有簡單的點、線組成的花紋，為一般貴族大小頭目家所常見的陶壺。其他很多陶壺是沒有花紋的，但也並不此而貶低其價值，有時其被看重之程度，反而在二、三等陶壺之上，但是只有貴族自己才能互相認定。

有關排灣族古陶壺的等級差異，也被族人視為不可逾越的輩份高下認知。排灣族研究者撒古流．巴瓦瓦隆依據其多年累積的調查資料，指出排灣族作為「婚嫁聘禮」與「祭祀用」的古陶壺，有著不可越級的「輩份順序」，依序共有六級，分別為：1. *maka tjuvuug*（意：來自完整）；2. *makaljeveljev*（意：來自豐饒）；3. *vinalingaljavan*（意：圓滿的象徵）；4. *pinu singisingan*（意：綴有鈴鐺）；5. *pinu calingan*（意：有耳朵）；6. *pin tjukapan*（意：有穿布靴）。上述「前三級」為不同部落的太陽氏族種子家庭（貴族）長嗣結婚時的禮聘以及分家時的信物，不可輕易帶離本家。而「後三級」則為較年輕的太陽氏族旁系或部落創始家族，在結婚及分家時按輩分互贈的陶壺。[16]

此外，在排灣族古陶壺的等級區分概念中，尚有一種以「性別」做為區分方式的標準。這些被稱為「頭目祖先」的陶壺，可以被區分成四個等級，依次分別為陰陽壺、公壺、母壺、人形壺：[17]

第一級為「陰陽壺」：兼具公壺與母壺紋飾，壺器身上有人頭與蛇紋圖騰，又有乳狀隆起裝飾。陰陽壺是陶壺中最尊貴者，族人稱之為 *dededan*。平時擺放於頭目家中柱的兩旁，是家中最神聖的地方。陰陽壺也是頭目聯姻時重要的聘禮，外人不得隨意觸摸。

第二級為「公壺」：在陶壺表面刻有百步蛇浮雕圖案或刻著人與蛇紋。

第三級為「母壺」：陶壺上有兩顆乳釘狀凸起，或者在壺底開有圓洞者。

第四級為「人形壺」：雕著人形的壺。

註 16 ｜撒古流．巴瓦瓦隆，《祖靈的居所》，屏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2013 年，頁 212-213。

註 17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排灣族》，臺北：臺原出版社．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2002 年，頁 273-274。

三、排灣族古陶壺紋飾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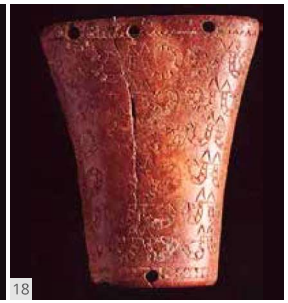
排灣族很早就已喪失了傳統製陶技術，排灣族人對於其所擁有的古陶壺，只知其為祖先所傳下，卻不知其明確來源。而透過臺灣考古出土史前文化的發現，或可較為具體的呈現排灣族陶器的源頭與發展歷程。首先是屏東地區所發現的史前時代晚期「北葉文化」；考古學者郭素秋女士比對了出土陶器的特徵，指出北葉文化（距今約 2,300 年至 2,000 年前後）陶器與排灣族古陶壺之間，在陶器器型、陶把、紋飾等特徵上，均可發現二者類緣上的關聯性。[18]

有關臺東南側與恒春半島所發現的「三和文化」，距今約 2,400 年至 1,200 年前後，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金屬器時代的史前文化類型。考古學者李坤修先生指出三和文化的舊香蘭遺址出土陶器、石器、骨器上所見百步蛇紋飾，「不只是具象的描繪，還有抽象線條的表達，顯示百步蛇紋在該社會已被廣泛而成熟的使用。這個現象與後來的排灣、魯凱族文化顯然有不可分的關連」。[19] 相關出土實物可見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盤蛇形附加堆紋陶片，其「型態已經和排灣族傳統陶罐上的百步蛇相近，是目前東部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之間最明顯直接相關的文化要素」（圖 16）。[20]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一件豬牙製飾品，其上陰線雕刻了兩條百步蛇紋飾（圖 17）；另一件鹿角製刀柄，外表則是雕滿百步蛇紋（圖 18），[21] 這些蛇紋形態為「雙身對稱」，兩條一組，蛇頭呈三角形朝上，蛇身相對，蛇尾朝向相反方向兩側蜷曲，蛇身內裝飾橫向短線。筆者認為這樣的蛇紋經常見於排灣族與魯凱族古陶壺的裝飾中，顯示了二者在特徵上的高度一致性。

至於三和文化陶器所見其他類型紋飾，諸如「圈印紋、人頭紋、三角形紋、亞字形紋、斜線劃紋、方格加點印紋等，亦同樣成為日後排灣文化的主要紋飾之一」。考古學者透過出土資料全面探討排灣文化起源的分析結果，指出「排灣文化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至三和文化……三和文化雖然繼承了部分的卑南文化要素，但也新出現了一些不見於當時或更早的臺灣史前文化要素。」而所謂新的陶器外來要素，則包含了新的陶器造形、百步蛇紋、圈印紋、刺點紋等紋飾，而這些特徵實為日後排灣文化中相當重要的內涵之一。[22]

16

17


18

註 18 ｜郭素秋，〈從考古資料看排灣文化的起源問題〉，200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stronesian Studies, Taitong: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2010. 202-204.

註 19 ｜李坤修，〈台東舊香蘭遺址的搶救發掘及其重要的發現〉，《臺東文獻》，復刊第 12 期（2006 年），頁 39。

註 20 ｜李坤修、葉美珍，《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期末報告，委託單位：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5 年，頁 170-171、圖版 129。

註 21 ｜李坤修、葉美珍，《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期末報告，頁 166、圖版 151、圖版 152。

註 22 ｜郭素秋，〈從考古資料看排灣文化的起源問題〉，頁 204、210。